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彭湃《海丰农民运动》之比较研究

邱德宇^{*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4)

【摘要】: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两人探索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总结。研究两文，既有助于深入体会两人的农民运动思想，又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与宝贵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彭湃；农民运动

【中图分类号】:A841.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7)02—0007—05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建党初期至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探索农民问题、开展农民运动，毛泽东与彭湃是其中的两位杰出代表。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是两人这一时期探索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总结。本文拟从写作目的、写作条件、思想内涵、思想特点四个方面对两文开展比较研究，并阐述两文的历史意义，从而既全面厘清两人的农民运动思想，又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与宝贵经验。

一、两文的写作目的与条件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②，全文最早于1927年3、4月间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第38期，第39期连续刊载，总计两万多字，包含“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十四件大事”等八个部分。全文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中心，结合运动的实际情况与不同阶级对于运动的各自看法，充分肯定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意义，有力驳斥了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并详细列举了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

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③，最早题为《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刊登在1926年《中国农民》第1、3、4、5期，总计六万多字，

¹ 收稿日期: 2016 — 12 — 16

作者简介: 邱德宇(1990—)，男，福建福州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² ①1927年3、4月间，本文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上先后发表部分章节；同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为其作序出版全文单行本；同年5月和6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部分。后来，本文全文编入《毛泽东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版，第182—183页。)本研究所引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均出自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³ ①“1926年9月，本文编进《农民运动丛刊》第19种，初次印出单行本。1926年10月，广东省农民协会将本书更名为《海丰

正文共分八节，并包含六个补充材料。全文全面分析了海丰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状况，生动记述了彭湃从1922年至1924年开展海丰农民运动的详细过程，并深刻反映了海丰农民运动的具体历程。从两文的写作目的与写作条件来看：

首先，两文都是为了回击当时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非议，并且反映农民运动的真实状况。

正如《毛泽东选集》关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题注所指出：“毛泽东此文是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而写的。为了这个目的，毛泽东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并写了这一篇报告。”^{[1] 12}的确如此，当时党内在对待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的态度上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分歧。1926年12月，毛泽东在汉口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案称，当前“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会上，湖南区委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态势，提出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但陈独秀和鲍罗廷不赞成解决土地问题，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另一方面，国民党右派开始攻击农民运动为“痞子运动”，批评其“破坏了社会秩序”，“扰乱了北伐后方”；同时，一些中间派分子也开始动摇起来，说农民运动已经“越轨”了，应该加以限制，防人利用。^{[2] 123-124}正是在这样多重复杂情况交织与国共战线内部矛盾日益突显化的背景下，从1927年1月4日开始，毛泽东“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2] 125-126}。“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希望通过亲身的体验与实际的调查，来了解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在结束考察后，毛泽东由长沙回到武汉，便致信汇报中共中央，在信的末尾，他还提到将就考察的详细情况尽早另写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察核，并希望予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登载。^{[2] 127-128}于是，才有了后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问世。

《海丰农民运动》则“开始写作于一九二三年，最初的部分草稿，‘七五’农潮时被毁，以后彭湃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周恩来等鼓励支持下，又重新起草，至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间才完成”^{[3] 136}。关于“七五”农潮始末，《海丰农民运动》第八节有详细记述，要言之：1923年7、8月间，海丰接连遭遇强台风侵袭，农民损失惨重，因而农会决议向地主提出减租，然而地主一方决心反对，借机挑起事端，并在同年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派人袭击海丰总农会，逮捕农会职员杨其珊等25人，此后为接济与解救被捕的狱中农友，彭湃等人辗转各地，最终利用陈炯明表面对农会的赞成与支持取得了成功，但到了1924年2、3月间，正在酝酿恢复的农会最终又遭到陈炯明的勒令取缔，彭湃与李劳工等人随即决定离开海丰，农会的活动与组织不得不转入地下。^{[4] 150-191}同时时期，批评海丰农民运动和彭湃的言论亦十分尖锐，李春涛在《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一文中提到，有一“超君”称“农民之趋农会恍如20年前乡人之趋向天主教”，并将彭湃形容为“教主”一般蛊惑民众的人物^{[5] 51}；李克家在《海丰的农民运动底一个观察——和雨后君讨论〈海丰的农民运动〉》一文中也提到，有一“雨后君”认为虽然组织农会的群众运动是好的，“但是因分子的坏行动，而致惹起有心群众运动者的怀疑，那就是群众运动的根本破产了”。^{[6] 138}根据上下文进行推断，此“雨后君”所谓的“分子的坏行动”，指的便是彭湃等农会骨干展开的与地主的斗争。因而面对着反对势力对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和非议，以及普通民众对于农民运动的不甚了解，彭湃自然迫切希望通过报告的形式，将海丰农民运动的来龙去脉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来。

农民运动》，作为‘广东省农民协会丛书之一种’出版，周恩来同志为本书题了书名，由陈延年同志亲自校订，定为学习农民运动经验的重要课本。1927年1月，湖南省党部农民部翻印了本书。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武汉主持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又翻印了本书作为该所教材。”（彭湃：《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2页题注）1953年，人民出版社将它作为中国现代史资料，收录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一书中。1960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单行本。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湃文集》将此文收录于第101—184页。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湃文集》将此文收录于第112—197页。本研究所引用的《海丰农民运动》，均出自201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彭湃文集》。

其次，两文都是源自对于农民问题的深刻关注，以及对于农民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

在建党之初，毛泽东的工作重心主要都集中在工人运动，而很少涉及农民运动。^④但从1925年年初开始，毛泽东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农民运动上来。1924年年底，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湖南养病。1925年2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后，一边养病，一边做社会调查，从而了解到韶山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村的阶级状况和各种社会情况，同时也向他们讲述国家的政治形势，农民穷苦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办法等，以启发他们的觉悟；同年3月，以毛福轩、毛新政、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等为骨干组织秘密农会，并通过他们发展会员；同年4月，通过杨开慧、李耿侯等发动进步教师，利用原来的公立学校、族校、祠堂等，在韶山创办农民夜校；同年8月，组织韶山农民开展“平粜阻禁”谷米斗争。^{[7] 129-133}在韶山的农村调查和农民工作，是毛泽东转入农民运动的开始。这段时间的实践经验，也为他之后进一步研究农民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之后，毛泽东又担任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全国农协总干事等职务。此外，他还被任命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创办了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是这些丰富的农民工作实践经验，为他撰写关于农民问题的有关文章，发表关于农民问题的有关看法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在此期间，毛泽东撰写与发表的重要文章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以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

彭湃则是“从教育入手”进行改革的失败，转而深入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的。《海丰农民运动》第三节开头，彭湃讲述了自己这一转变历程。192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初，彭湃担任了海丰教育局长，原本是想“从教育入手去实现社会的革命”，因而先去“召集全县男女学生多数有钱佬的儿女”，但是彭湃亲自组织的“五一”劳动节游行，竟然“绝无一个工人和农民”参加，事后彭湃自己看来，“实在是幼稚到了不得”，同时反对保守势力在陈炯明的家乡报《陆安日刊》上连续攻击彭湃等进步青年的行为是在搞“赤化”，是“将实行共产公妻了”；1922年，彭湃便和李春涛等人开办了《赤心周刊》，希望以笔为战，与反对保守势力展开思想论战，后来彭湃渐渐明白，自以为是“工农群众的喉舌”的《赤心周刊》，其实“背后绝无半个工农”，海丰广大的工农群体中鲜有人知道和理解彭湃办此报刊的由来与目的；同年5月，彭湃便“放弃《陆安日刊》无谓的笔战，而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4] 122-123}而在1924年4月上旬抵达广州以后，彭湃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正式身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等农民工作的要职，并全身心投入大革命的浪潮中，他的经验与视野均有所扩展。其间，彭湃接连领导了广宁、花县、海陆丰等地的农民运动。为培养农民运动的合格干部，彭湃还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担任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1届和第5届主任。^{[8] 198-199}丰富的农民工作实践经历为彭湃积累了充足的素材和经验，加上陈延年、周恩来等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彭湃写作中共第一篇系统的农民运动报告的想法也变得愈发强烈。但由于从事广东农民运动的彭湃工作十分繁忙，直至1926年1月，《海丰农民运动》才得以陆续刊登发表。

二、两文的思想内涵与特点

以下将就文本所反映出的思想内涵与思想特点，对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加以比较。

第一，两文分别反映出建党初期至大革命时期，前后两个阶段、两个地域农民运动的具体历程。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反映的是1926年至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基本状况。首先，他从纵向上将运动大致

⁴ ①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正全力从事工人运动的毛泽东，并未完全忽视农民问题，1923年4月，毛泽东曾派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到他们的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岳北白果乡开辟农运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0—111页。）

分为两个时期:1926年1月到9月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组织时期又分为1月到6月的秘密活动时期与7月到9月的公开活动期,此时农民运动发展较为缓慢,“农会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什么斗争,因此各界对它也没有什么批评”;1926年10月到1927年1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此时农民运动发展极为迅速,“农会会员激增道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一切权利归农会”是其最基本的特征。^{[1] 13-14}之后,他又从横向上将湖南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过细检查一遍”。这十四类大事可分为前后两大类,前七件主要指农民与地主进行的斗争,包含“政治上打击地主”“经济上打击地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等;后七件主要指农民所开展的关乎农村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建设,包含“农民诸禁”“合作社运动”“修道路,修塘坝”等。^{[1] 22-41}

《海丰农民运动》虽写于1924年至1925年间,但它叙述的是彭湃1922年至1924年在海丰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过程。从彭湃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1922年至1924年海丰农民运动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1922年6月,彭湃、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组成六人农会,标志着海丰农民运动的开始;其后至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为农会发展时期;其后1923年7月,广东省农会成立,为高潮时期;其后至1923年7、8月间,“七五”农潮发生,农会被宣布解散,再至1924年3月,短暂恢复的农会最终又遭取缔,为挫折与低潮时期。^{[4] 122-191}其间,彭湃重点叙述了海丰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与地主展开的两次斗争:一为上文提到的“七五”农潮;二为与“粮业维持会”的斗争,简言之,海丰县城有一名地主朱墨,与佃户余坤等六人发生租佃纠纷,因而向法庭起诉,但在农会的介入影响下,朱墨一方败诉,于是他便联合陈月波、陈开庭、王作新等地主成立了“粮业维持会”,并促使法警逮捕了余坤等六人,彭湃随即号召六千余名农会成员向法庭请愿示威,要求释放被关押的农友,最终取得胜利^{[4] 139-145}。而关于海丰农民依托农民协会所开展的关乎农村自身的建设活动,则包含宣传、教育、农业、仲裁、卫生等方方面面。^{[4] 135-137}

学者高熙在《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一书中,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开始,到1924年年初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结束;第二时期是从1924年年初到1926年北伐前夕;第三时期是从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到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9] 2-7}因此,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反映的农民运动,属于第二、三阶段;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中所叙述的,则属于第一阶段。由于分属于不同阶段,两者有着不同特点。相比而言,1922年至1924年海丰农民运动尚属于农民运动之探索阶段,手段较为渐进,与地主斗争也大都采用游行、集会、说理等和平手段,并未有暴力打击地主或推翻政权之举。1926年至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则伴随着国民革命的高潮——北伐战争。在此时期,国民革命军高歌猛进,反动军阀被逐一推翻,民众逐渐获得了集会、结社、罢工、游行示威等政治自由,因而革命群众运动的巨浪也随之翻腾汹涌起来,在北伐军通过与占领的地区,农民运动进一步蓬勃高涨,尤其是在以湖南为首的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纷纷成立,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等农村反动阶级被纷纷打倒,农民们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与武装,农村里掀起了一场无比猛烈的革命大风暴。^{[10] 179}

第二,两文分别表达了毛泽东、彭湃关于农民运动与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

农民运动思想基本包含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农民运动之重要性问题,二是农民运动之可能性问题,三是农民运动之具体方法问题。简而言之,第一、二方面的内容是农民运动“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农民运动“怎么办”的问题。

关于农民运动之重要性与可能性,两文的论述角度有所不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主要是为批驳当时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与非议入手展开论述的。首先,批驳“糟得很”,认为“好得很”。对于农民的“造反”行为,“绅士”“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甚至是部分“很进步的人”也都称其“糟得很”,毛泽东的看法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得很”。^{[1] 15-16}其次,批驳“矫枉过正”,认为“矫枉必须过正”。针对中派的“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的议论,毛泽东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认为之所以如今

农民的反抗如此之激烈，是由于原先地主的压迫无比之深重，这“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并且“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1] 17}最后，批驳“痞子运动”，认为是“革命先锋”。针对国民党右派的“痞子运动”“懒农运动”的责难，毛泽东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分析了农民阶级中各个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他们各自的革命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农民阶级可以大致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个阶层，其中富农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需要努力争取他们，多向他们作解释工作，贫农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因而是最革命的力量，应该由他们掌握农会的领导权，而不应该错误地打击他们。总而言之，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通过“三个批驳”与“三个认为”，从而既表明了自己对于农民运动的基本态度，又论证了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与巨大潜力。

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则主要从分析海丰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出发展开论述。彭湃认为，海丰农民一直都处于严重的政治压迫之下。文中指出，“海丰的农民一直是隶属于满清的皇帝，官僚，绅士和田主这班压迫阶级底下”，彭湃将这种状况通过形象的比喻描述为，“农民怕地主绅士和官府好像老鼠怕猫的样子”，彭湃认为，海丰农民可谓“终日在地主的斗盖，绅士的扇头，和官府的锁链中呻吟过活”。^{[4] 112-113}在经济上，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的双重冲击和压迫，“农产品之价格及其量只得保持原状……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亦异常重大”^{[4] 116}，海丰农民往往是入不敷出，无奈只有寻找各种弥补亏空的办法，轻则寻求斩差割草、抬轿挑工等其他谋生手段，重则典卖、借债、压迫父母妻儿乃至嫁妻卖儿等。对于海丰农民的文化地位，彭湃在文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海丰县城所存在的教育极不公平的现象。他揭露到，海丰的广大农民群体承担着海丰全县城80%的教育经费，但是“农民倒不知道教育是甚么东西”^{[4] 120}，根据彭湃在文中的统计，海丰县城的农民中，不能够写自己姓名的占到80%之多，而会写自己姓名的仅占到20%。从这一现象和统计中，我们便能直观地看出海丰农民的文化状况之恶劣。总而言之，彭湃认为，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均遭受着深重的压迫，而如此处于低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农民，其阶级自身天然地怀有走向反抗与革命的基本诉求，只是这样的革命性与阶级意识被天生的保守性与传统观念所遮蔽，因而开展农民运动的革命者所要做的便是破除保守性与传统观念对他们的束缚，将这种客观存在的农民运动之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

关于农民运动之具体方法。从宣传教育农民、广泛组织农会，到建立统一战线、注意斗争策略，再到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解决土地问题，在理论上这当中蕴含着有一套拥有大致时间先后的行为与行动逻辑，但付诸具体操作，又要同时展开。正如上文所言，由于两文所反映的农民运动，隶属于建党初期至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前后不同阶段，前者是探索阶段，后者是高潮阶段，因此两文关于农民运动之具体方法的论述侧重点亦有所不同。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论述重点，集中在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等农民运动的核心与本质问题上。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则集中在宣传教育农民、广泛组织农会等农民运动的前提与先导问题上。即使在同一问题上，两文的论述重点亦有所不同。

譬如，在推翻地主政权问题上。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核心观点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他认为“地主权力即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1] 14}在列出政治、经济上打击地主的各种方法之后，他还指出推翻地主政权的四个重要方面：一是都团作为旧式的区乡政权机关，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必须予以推翻；二是为推翻地主武装，必须建立农民武装；三是县政由县知事和土豪劣绅勾结而成，也因予以推翻；四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1] 31}。由此看来，毛泽东对于推翻地主政权的意义与方法均有全面而重点的论述。相较而言，彭湃除了指出在经济、政治上与地主开展斗争外，对于农村具体权力结构、如何建立农民武装等问题则没有展开论述。

再如，在宣传教育农民问题上。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对于“普及政治宣传”的重要作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政治口号，“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等孙中山遗嘱中的内容，之所以能老少妇孺皆知，“全是共产党和农民协会的功绩”。^{[1] 34}但对于宣传教育农民的具体方法，彭湃的论述

则比毛泽东详细、全面。在《海丰农民运动》中，彭湃在宣传教育农民时，很好地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宣传教育农民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二是团结起来的重要性。因此，不论是与农民闲谈，还是向农民演讲，不论是为农民算经济账，还是为农民鸣不平，彭湃的核心内容都是希望农民明白，是地主剥削农民，是地主欠农民账，而非相反。此外，彭湃等人起初要求农民加入农会时，一般农民则均不愿意。于是彭湃便通过生动的比喻来教育农民，他将农民加入农会，比作“联合的过河”，农会便是广大入会农友相互帮助、相互扶持的组织依靠，是“亲如兄弟的机关”。^{[4] 129}结果，农民们才渐渐加入了农会。彭湃宣传教育农民的形式也可谓丰富多样，包括搞演讲、发传单、变魔术、耍杂技、编歌谣、演戏剧等等，但究其本质，就是要真正融入农民，并通过农民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

第三，两文分别体现出毛泽东、彭湃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领导者的不同风格和特点。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领导农民运动方面更善于理论分析和总结，彭湃则更善于实践开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晚于《海丰农民运动》一年发表，毛泽东在此文中能够高屋建瓴地论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能够站在宏观的视野向我们展示湖南农民运动的概貌，划分湖南农民运动的时期，能够直接、正面、有力地驳斥种种对于农民运动的非议和责难，能够直指并全面论述农民运动的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等农民运动的核心与本质问题，都充分体现了其深刻的理论分析和总结能力。除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与农民运动相关的重要文章中，均可看出毛泽东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总结能力。

《海丰农民运动》则是彭湃的代表作，它主要是记述彭湃1922至1924年在海丰开展农民运动的具体过程，除了在开头部分分析了海丰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外，没有再着重作其他方面的理论分析，因此在理论性上的确不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深刻和鲜明。但此文早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年发表，其特点在于文字精练、通俗易懂，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第一篇系统的农民运动报告，又是农民运动工作者学习农民运动基本工作方法的典型案例与教科书，有着极强的实践开创意义。此外，在短暂的一生中，彭湃在实践上开创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上的多个“第一”，除了撰写《海丰农民运动》外，他还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海丰总农会，担任了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等。

三、两文的历史意义

1927年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为之作序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的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7] 182-183}由此可见两文在当时历史背景与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革命与农民问题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政党，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再加上受到俄国革命道路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于是把发动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置于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但与此同时，也轻视了中国农民阶级中所蕴含着的巨大革命力量，忽略了宣传教育农民，组织农民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与可能性。而到北伐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农民问题视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5月，党领导召开的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专门作出《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之地位决议案》，其中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革命时一个农民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能否进展和成功，必以农民运动能否进展和成功为转移”。^{[10] 157}由此可见党对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的转变与深化，无疑得益于彭湃、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期间对于农民运动与农民问题进行了不断的、艰辛的实践与理论探索。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正是两人当时探索农民运动与农民问题的思想表达与理论总结。

诚然，两文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评价历史文献与历史人物，倘若一味就文论文，就人论人，就事论事，往往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回溯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既非一蹴而就，也非个人创造，它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所决定的，是在一代代革命者前赴后继、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最终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虽也有其不足之处，但倘若将两文置于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滚滚历史洪流之中，那么，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便愈发突显出来。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传(一)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3] 蔡洛等. 彭湃传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 [4] 彭湃. 彭湃文集 [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 [5] 李春涛. 李春涛文集 [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 [6] 彭湃研究史料:上卷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 [8] 郭德宏编著. 彭湃年谱 [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 [9] 高熙. 中国农民运动纪事(1921—1927) [M]. 北京:求实出版社, 1988.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